

陳瑤，《玉扣紙：閩西手工造紙業的社會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24年，348頁。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呈現多元化特徵，不同區域在經濟基礎、社會控制體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差異顯著。故而，區域研究成為理解中國傳統社會變遷的重要路徑（傅衣凌，〈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頁1—7）。在區域社會史的視野下，將行業置於地方社會結構、國家經濟政策以及全國乃至全球貿易市場的多層級框架中，探尋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演變軌跡，是研究行業史的重要方法。這一方法不僅關注行業內部的運作機制及從業者的組織方式，還強調行業與國家、市場及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突破了單純的行業內史的敘事，拓展了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陳瑤的研究正是沿着這一學術脈絡展開。從《江河行地：近代長江中游的船民與木帆船航運業》（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到《玉扣紙：閩西手工造紙業的社會史研究》，她始終關注行業內部的人群及其組織，以及行業在社會轉型中的嬗變與存續。本書進一步將社會史與物質文化史相結合的研究範式引入對行業史的觀察，全面梳理了閩西玉扣紙本身及其產業、產鄉由傳統至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興衰變遷。

本書共有6章，前兩章主要探討本書的學術史定位，以及玉扣紙的釋名和製作技藝。第一章開篇從紙的科技史研究成果切入，梳理中國傳統造紙技術的發展脈絡，進而探討玉扣紙的製作特點及其命名由來。書中指出，玉扣紙是閩西長汀地區的區域性名紙，光潤細薄，製作工藝以生料法為主，屬於宋代以降佔據主流的竹紙體系，並在民國時期發展成為當地代表性紙種。直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玉扣紙才真正進入紙的科技史和地方史的書寫範疇，但相關研究仍不系統。基於此，作者在進一步回顧學界關於紙的經濟史、文化史研究成果的研究成果後，倡導從社會史的視角出發，將玉扣紙產業置回中國傳統手工造紙的時空環境，深入探究其「生命史」（頁6）。第二章聚焦於玉扣紙製作技藝的歷史傳承與變遷。通過系統梳理明代後期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文獻，研究呈現了包括玉扣紙在內的福建竹紙的生產流程與技藝特徵。同時，結合在治平畬族鄉胡蘭山紙寮、雷玉盛紙寮開展的田野調查，以及親身參與觀察的造紙實踐，作者展示了現今玉扣紙製作技藝的傳承情況，實現了文本記載與實踐體驗雙向印證。該章結尾部分強調，玉扣紙手工技藝的延續不僅依賴於山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更根植於山區民眾吃苦

耐勞、精益求精的人文素質。由此也將討論維度從物質技藝層面拓展至紙業從業者及其社會文化生態。

第三至五章以治平畚族鄉為視窗，歷時性地分析了造紙業的興起、近代變遷及當代轉型。第三章圍繞治平鄉造紙業的興起展開論述。由於官方文獻中幾無紙業初興的記載，作者藉助治平鄉12個建制村、18個主要姓氏的33套族譜，從山區畚民、平原漢民、山區漢民三條移民路線入手，細緻梳理山區業紙為生的居民的遷入順序及村落開發的歷史。同時，結合十鄉輪祀靈官大帝儀式的展演與運作，深入探討漢民基於宗族網絡構建的地域聯盟的特徵。自唐宋以來，畚民與漢民陸續遷入治平一帶。然而，二者在生活空間、制度身分和文化傳統上存在較大區隔。漢民多為編戶齊民，手握土地產權，而畚民因無地可墾，主要依附於漢族地主，以佃農身分謀生。時至18世紀中期，山區漢民在當地引入造紙技術，逐漸以此為業，並吸引畚民參與紙業生產。在這一過程中，畚、漢兩族在造紙業的共同勞動中建立的合作關係，促使原有的社會隔閡日漸消弭，社區融合之態漸顯。

第四章探討了20世紀上半葉玉扣紙的產銷體系及其在戰亂中的變遷。作者首先從生產、運輸、市場和消費4個方面展陳了玉扣紙業在近代的發展態勢。隨後，考察蘇區時代與抗戰時期玉扣紙產銷體系的衝擊與重建，揭示出紙業從業者在動盪時局中的生存策略。作者認為，儘管戰爭、市場波動以及紙商的利貸與預購模式限制了產業的自主發展，使槽戶與紙農陷入經濟困境，但玉扣紙業仍在動盪中維持生產，並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產區與市場網絡（頁206）。

至新中國成立後，閩西紙業迎來新的發展。第五章利用檔案資料與口述調查，進一步分析了計劃經濟時期玉扣紙業如何被納入國家經濟體系，並探討其在市場經濟改革及機制紙大規模生產背景下的發展路徑調整。同時，作者還重點關注玉扣紙生產者在社會轉型中如何因應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此外，該章還厘清了1974年中央調運玉扣紙印刷毛著的歷史細節，確認寧化縣檔案館收藏的線裝大字本《毛主席詩詞》正是當年國家出版局回贈寧化縣的書籍，確係治平玉扣紙印製（頁245）。

在全書的末章中，作者挪借達恩頓歸納的18世紀歐洲的「紙張意識」，提出「玉扣美學」的概念（頁280），強調紙張質量在生產者、經銷者與消費者之間所形成的共有知識與共同情感。「玉扣美學」不僅體現為造紙者對高品質紙張的執着追求，也反映在經銷者和消費者對玉扣紙獨特性的認同與

珍視。作者期望通過造紙者與用紙者的共同參與，使玉扣紙得以傳承，讓這一傳統工藝融入當代審美體驗，並延續至未來世代。

本書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回顧學界現有的紙業研究，大多集中於科技史、經濟史與文化史領域，社會史視角較為少見。艾約博(Jacob Eyferth)關於四川夾江造紙業的研究是少數從社會史角度系統研究中國紙業史的專著(艾約博著，韓巍譯，《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本書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研究範疇。儘管作者自謙本書僅為一部史料整理和口述訪談的考察報告(〈後記〉，頁348)，但我們能從中看出其對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有着精準的把握。在結構上，作者以玉扣紙的生命史為經，以業紙為生的人群為緯，貫通物質文化、行業與社會等多重面向，勾勒出玉扣紙本身及其產業經濟、產鄉社會在長時段中的變遷，並最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語境下揭示其從生產實踐向「玉扣美學」的轉化。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將歷史人類學引入紙業研究，通過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相互印證，深入探究玉扣紙業的生產體系及其社會生態。在寫作風格上，本書不僅以生動敘述讓沉默的紙張能夠「開口言說」其社會生命史，讓讀者彷彿親臨歷史現場，而且始終秉持嚴謹的史學態度，細緻考證傳說源流，憑藉扎實的史料來廓清事實。

如何融通社會史、物質文化史、行業史，串聯起物的社會、文化與經濟面嚮，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複雜議題。本書對此進行了有益嘗試，但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作者以玉扣紙核心產區為中心，並延伸至周邊聯動的區域。雖對紙的產、評、運、銷、用的全過程都有分析，但大部分篇幅集中於手工造紙業生產空間，對初級市場和轉運中心長汀，以及粵東潮汕地區、香港、南洋等主要消費市場的研究有待深入。在討論玉扣紙式微的原因時，作者關注了機械化造紙對傳統手工造紙業的衝擊，但對20世紀上半葉半機械化與改良土紙的影響僅作零星提及。同時，近代以來洋紙的大量傾銷對國內手工造紙業的衝擊，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議題。在史料運用方面，本書主要依賴長汀、寧化兩地檔案館的資料，若能進一步挖掘省級乃至中央檔案資料，或可深化對國家、市場與地方社會互動的理解。

儘管如此，作者立足區域，又兼具全球視野，為讀者留下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例如，玉扣紙由閩西銷往粵東客家地區乃至香港、東南亞，其跨區域流通的歷史脈絡如何進一步細化考察？再如，玉扣紙「發行半天下」

(頁14)，消費地區是否同步引進手工造紙技藝？這些問題不僅關涉玉扣紙自身的生命史，也關聯着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變遷，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于悅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

計小敏，《江蘇水域的政治地理研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2年，287頁。

近年來，學界開始注意到與陸地社會有所區別的水域社會，徐斌等學者試圖建構「新水域史」，強調以水上活動人群為本位探究水域社會的內在運行機制（徐斌，〈以水為本位：對「土地史觀」的反思與「新水域史」的提出〉，《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第1期，頁122—128）。要言之，相比農業人群，水上人群流動性更強，而以傳統國家的治理能力，難以對這些人群進行有效管控，因此湖區的秩序往往由自發的「習慣」與國家確認的「業權」互動形成。明清王朝的漁課制度效力有限，卻成為水域控者表明產權的正統性工具。這樣的水域社會秩序會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如火如荼的20世紀迎來怎樣的巨變？趙世瑜用蘇州東山的案例描繪了江南水上人前往上海融入國際市場的歷史過程（趙世瑜，《猛將還鄉：洞庭東山的新江南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與趙世瑜立足於水上人的視角不同，計小敏新著《江蘇水域的政治地理研究》試圖回到國家視角，從政治地理的維度出發，勾勒江蘇水上政區變動，進而討論20世紀的現代國家如何控制內陸河湖及生息其上的水上人群。

為何以江蘇為例進行討論？作者在緒論中提出，時至今日江蘇仍是全國內陸水系最發達的省份，且省域內存在兩大水上人聚集區：蘇北里下河地區與蘇南太湖地區，歷史時期水域治理問題突出。隨後在第一章中說明，從東晉直至明代，王朝國家均難以深入水域進行管理。清王朝建立後，有意識地對重點水域進行管理，並設置水師營，太平天國戰爭後更是推廣水上保甲，不過其設置從空間分布上看重江南而輕江北，且收效有限。民國時期政府則以水警取代水師，繼續編排水上保甲，然而管理混亂，無法完全深入水面進行治理。